

30 三十年集



一份执著，一份眷恋；一种信念，一种姿态

滴石集


 Thirty Years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朱永新◎著



Thirty Years

滴石集

朱永新◎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滴石集/朱永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
ISBN 978-7-309-08833-5

I. 滴… II. 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0450 号

滴石集

朱永新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2 字数 364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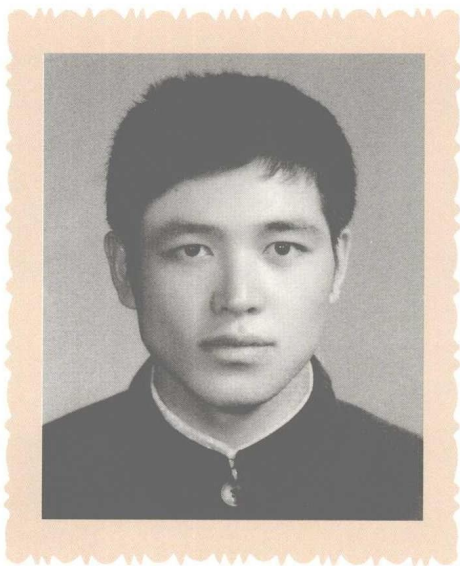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833-5/C · 235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大学入学时照片（1978）



与袁振国教授摄于上海
师范大学（1981）



与导师燕国材教授（1982）

30

THIRTY YEARS / Zhu Yongx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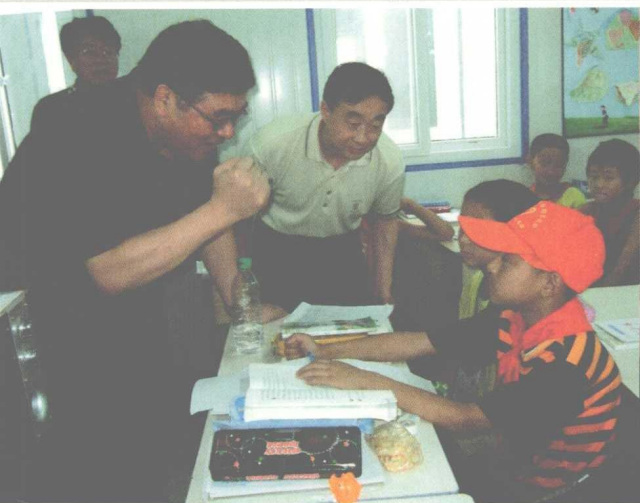
朱永新



在日本访学期间与导师篠田雄
次郎等（1990）



与博士生导师沈荣芳教授和
吴启迪教授（1997）



汶川大地震以后在北川八一帐篷学校（2008）



《朱永新教育文集》韩文版签约（2010）

30

THIRTY YEARS / Zhu Yongxin

朱永新

自序：在学海遨游——30 年治学生活回顾



2011 年 6 月初，到上海参加民进中央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中心的会议。晚上与陈思和、栾梅健、贺圣遂兄小聚。思和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脚步集》，是复旦大学出版社“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一种，装帧精美大气，创意新颖独特，看后爱不释手。

贺社长介绍，书的作者都是当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30 年来，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不懈寻觅着。出版社试图通过出版他们的自选集，记录这些“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精神家园的守护者”的心路历程，通过他们的独特道路，展示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贺社长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本来他们的计划是 30 年 30 人，但现在丛书已出版 37 本，因其中尚缺教育学者人选，总觉有些遗憾，“你正好自投罗网，就帮我写第 38 本吧”！这个晚上，两瓶梅建兄带的茅台，基本上是我与圣遂兄喝光。借着酒兴，我答应下来。因为我与儿子都是复旦大学的校友，能为母校的出版社尽点心力，自然非常开心。这就是本书写作的缘由。

于是，以思和兄的《脚步集》体例为模板，开始紧张的选编工作。序言、正文、附录、规模，都尽可能参照模板进行。用了近一个月的业余时间，总算大功告成。按照体例，必须写一篇 30 年人生旅程和学术生活的小结，所以按照时间与主题两个维度整理如下。

一 激情燃烧：在天堂读书的日子

1978 年初，我背着一个自制的小木箱，从苏北某小镇，来到苏州，来到这所当时叫做江苏师范学院和学校。从此，我的生活，我的命运，就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刚进校时,我读的是政史系,100多人的班级。不久,政史系又分为政治教育与历史教育两个系,但班上的同学已经感情深笃,不再分离。同学中许多是老三届的,不仅社会经验丰富,而且知识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卓越,我常常暗自感佩。而我们的老师,大部分也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循循善诱。两代被耽误的师生,一起用心在教室耕耘,演绎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听同学们谈笑风生,说古论今,我内心深处常有强烈的自卑感。于是,开始拼命恶补。先是效仿某位伟人,每天清晨在学校操场长跑10圈左右,回到宿舍冲个冷水澡,神清气爽,然后去教室自习。后来竟参加了学校的长跑队,尽管成绩平平,但耐心与坚韧,从此伴随着我的人生。

中学基本没有学过外语的我,有段时间疯狂学习英语。把薄冰的英语语法书、张道真的教材翻了又翻,读了又读。嫌枯燥,于是找原版书翻译来学习。记得当时翻译了一本《东方故事集》,还兴致勃勃投稿到出版社。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此不惧怕学习外语,后来到日本学日语,也是如法炮制。

我的同桌刘晓东是高干子弟,他喜欢读书,经常逃课泡图书馆。他告诉我,读书比听课效率高,而且收获大。我不敢逃课,倒经常读他借来的书,从福泽渝吉的《文明论》到《第三帝国的兴亡》;从《林肯传》到《光荣与梦想》……后来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几乎两三天换一批,与图书馆的老师们混得很熟,经常多借几本回去。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幸福的时光。我不敢说,自己那个时候真正读懂了多少,但我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从此养成。

书读多了,就有写作的冲动。当时许多同学对作业怨声载道,我却毫不介意。我把每次的作业作为挑战,力图写成有一定水准的文章。记得有一次就一篇关于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文章,请教吴建国教授。他是我们非常崇敬的老师,前苏联留学回国的哲学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过论文,讲课逻辑严谨,见解深刻。到他家里,他对文章的结构、内容、文字全面点评,还鼓励了我一番。拿回文章一看,竟然没有片言只语的批注。对老师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学问,怎样去做学问。

那时,还有一段为文学疯狂的日子。卢新华的伤痕小说,点燃了许多大学生的文学梦想,不仅中文系的同学热情高涨,我们文科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如痴如醉。著名作家范小青与我们同在钟楼前的老文科楼学习,那时还不认识她,只听说中

文系有同学在写小说。文科楼下经常有他们的作品展示,我们班级的荀德麟经常与中文系的学生唱和,我也开始大量读文学作品,读中外诗词,也悄悄写了不少诗歌。虽然大部分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从此喜欢读诗,喜欢诗意与激情的生活。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人生一点点充盈。我慢慢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开始向往新的生活,思考未来的天空。

这时候,学校急需补充教育心理学教师,决定在大三学生中选拔5人送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研修班打造。一下子几百名同学报名。我有机会过关斩将,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我开始从江苏师范学院的学生,成为一名学员的“准教师”。

二 追随燕师：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1980年9月,我有幸来到上海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学研究班学习。这是“文革”后心理学科首次在该校重新开课,学校组织了最强阵容的师资队伍。其中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恩师燕国材先生。燕先生博学多才,在课堂上他倡导“标新立异,自圆其说”的治学方法,激起我们的创造冲动;他反对“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心理学教学与研究,主张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遗产,并身体力行,出版了《先秦心理学思想研究》等一批专著,引发我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激情。

可以说,我是在燕先生的谆谆教诲与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走上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道路的。

从1982年起,我先后参加了全国统编教材《中国心理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的编写工作,受到比较系统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法的训练。而《心理学人物辞典》和《心理学著作辞典》的正式出版,则可视为我单独开展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标志。

《心理学人物辞典》和《心理学著作辞典》,分别于1986年和198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张人骏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工具书。《心理学人物辞典》介绍了336位中外心理学家的生平和学说,其中137位中国学者的生平与心理学思想,是国内首次介绍。《心理学著作辞典》介绍了423本中外心理学著作,其中国内首次介绍了95部(篇)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文献。这两本工具书是国内第

一部系统介绍中国心理学人物和著作的工具书。

此外,我还发表了《张载的学习心理思想》、《王廷相心理思想初探》、《刘智〈天方性理〉对大脑研究的贡献》、《颜元心理思想初探》、《陈确的心理思想述评》、《二程关于“知”的心理思想》、《挖掘中国古代心理思想的宝藏》、《王夫之心理思想研究》、《陆九渊心理思想研究》、《王夫之学习心理思想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十年来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等 40 余篇论文,大多在国内有影响的《心理学报》、《心理科学通讯》、《心理学探新》、《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其中在美国《大脑与认知》(Brain and Cognition, VII, 1989)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古代学者对于大脑研究的贡献》(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Scholars to the Study of the Human Brain)一文,把世界上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学说提前了近一百年,为我国心理学界争得了荣誉,引起国际心理学界广泛关注,20 多个国家的 30 多位学者来函祝贺,并索要论文。这一系列的研究使我初步完成“探矿”工作,形成对中国心理学史的框架性把握,也初步掌握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方法。这一时期,我还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教材的编写工作,和《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四卷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8—1990 年版)的编写工作,前者作为主要作者和统稿人,后者作为副主编和主要作者。在我的心理学研究生涯中,最感幸福的是和许多前辈学者一起参加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学科建设,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曾对中国心理学史学科创建及发展问题撰写过一篇长文,其中具体分析了中国有无心理学思想、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中西心理学史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近现代心理学的继承以及中国古代心理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把握中国心理学史的特点,进一步增强“内外并重”的心理学史研究意识,进一步拓宽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领域以及进一步加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分工与协调等具体问题。这篇论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进行思考,引起心理学史界的广泛关注。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进一步开拓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领域?如何在中国心理学历史研究中具有自己的特色?为此,我和导师、同仁、学生们开展一系列的探索,在中国教育心理学思想史、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和中国管理心理学思想史三个领域爬罗剔抉、系统研究,发表和出版了

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和著作。

（一）关于中国教育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教育传统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创办学校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教育不仅是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中国古代具有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同时也蕴藏有非常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但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心理学不是言必称西方，就是言必称苏联，而对我国自己的有关思想却很少问津。这显然与我们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不相称。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决定用现代教育心理学的眼光，对我国古代教育心理思想遗产进行分析整理，以充实我国教育心理思想史。

1991年，我与我的导师燕国材教授合著出版了《现代视野内的中国教育心理观》一书，共六章（另有绪论和附录）：绪论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教育心理思想的发展简史、基本特点、主要成就和贡献；第一章分析了中国教育心理思想的基本理论；第二章至第六章依次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学习心理思想、德育心理思想、差异心理思想、教师心理思想、心理测验思想等。

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教育心理学的直接影响下，我国的教育心理学也获得了发展。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国教育心理思想史的全貌，我们撰写了《中国近代经验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作为“附录”以飨读者。其中我主要完成了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和附录的撰写任务。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心理学史的著作。

（二）关于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

刑罚与教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双刃剑。在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心理学史的过程中，我涉猎了大量刑罚与犯罪心理学思想的资料，对中国古代学者关于犯罪的原因论、预防论、惩罚论等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

1993年，我与时任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艾永明先生合著出版了《刑罚与教化——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论》，高觉敷先生为该书作序，称该书为“创新性的著作”，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该书历述我国自古至今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的演变，但关于这种思想史并没有专著可供参考，必须博览群书，深挖细掘，然后才有所得，其工作的艰苦可想而知。

《刑罚与教化——中国犯罪心理学思想史论》是国内第一部研究古代犯罪心理思想的著作,该书分三编:第一编先秦部分,以学派观点为重点,分别研究殷周时期和儒家、道家、法家和墨家的犯罪心理思想;第二编秦汉至隋唐和第三编宋、元、明、清部分,以人物思想为重点,系统整理汉初黄老学派、《淮南子》、贾谊、董仲舒、王充、诸葛亮、玄学家、傅玄、刘颂、张斐、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理学家、王安石、《折狱龟鉴》、张养浩、王夫之、曾国藩和沈家本等人物、著作或学派的犯罪心理学思想。该书被《法制心理学辞典》等作为条目收录介绍。

(三) 关于中国管理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

21 世纪的管理面临着三大挑战,即世界经济发展中心可能移向亚太地区;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使世界经济活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可持续性发展观念对现代创新管理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在东方土壤上必将孕育出一种融合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科学和人文的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因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东方管理已成为共识,是我们的强国之道。

任何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出现和发展总必须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缺少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中管理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不仅是世界管理科学文化的缺憾,也必将不利于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成熟。因此我觉得应该把中国特色的管理心理学或者说本土化的管理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不仅是应用心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之必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史的研究为基础显然不行。

1997 年,我有幸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79770057),我和课题组成员从 1997 年到 1999 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整体把握和系统描绘传统管理智慧主要内容方面做了初步探索。1999 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华管理智慧》一书,并有十多篇论文先后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等国内权威性刊物上发表。

我们课题组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概括出中华管理智慧的五大特色——“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中庸之道、无为而治”,并以先秦为起点对古代管理心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着重研究了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

还对董仲舒、王符、刘劭等人的管理心理学思想进行探索,对建立中国特色管理学和管理文化的应用理论体系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并能够指导现代企业家进行本土化经营管理活动。对于中华管理智慧的五大特征的揭示,以及对中国古代目标管理、人力管理、环境管理、时间管理、信息管理等内容的具体阐释,是我们课题组对中华管理思想史和中国心理学史的一个新贡献。我的博士后导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在为《中华管理智慧》一书作序时说:“阅读此书,能够从中领略五千年管理文化的苍劲与淳朴,体验古老文明活力的悠久与蓬勃,感悟古代智者启迪的深邃与高远,这对现代企业管理者和管理理论研究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大部分论文都曾参加全国或国际会议的交流,在 1997 年第三届世界管理学大会(上海交大)、1999 年第三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北京)、1999 年世界华商管理大会(上海复旦)、2001 年第九届全国心理学大会、2002 年第四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究会(台北)和 2002 年东方管理论坛学术年会等会议上受到好评。

后来,我又申请到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都与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有关,一个是“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另外一个“诚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价值研究”。前者的主要成果是 100 余万字《管理心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用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的五个重要特质及其在现代企业的应用,进行系统的研究,由经济管理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者的成果除一系列论文外,主要是《诚信启示录》一书,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解剖,分析中国传统的诚信价值如何丢失与创建的问题,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总之,我是通过对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走上学术道路的,无论是研究激情、研究方法,还是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兴趣,都是由此培养起来的。虽然由于工作的变动,从 1997 年开始逐渐远离心理学史领域,但是对于它的关注并没有停止,真希望退休以后,能有机会“重操旧业”,再过一把研究心理学的瘾。

三 朋友砥砺：热情写作的岁月

在从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同时,作为调剂和修炼,我一直在心理学科普方

面努力耕耘。这与袁振国先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振国比我小一岁,应该是我的老弟了。大学三年级时,我们分别从苏州和扬州来到上海师范大学。他瘦长的个子与我肥胖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朋友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不仅合作写文章,而且可以说相声。

振国最初给大家的印象是扬州才子。到底是中文系出身,那优美的文笔让我们羡慕不已。学习时间不长,他的一篇关于灵感研究的论文就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报上发表。我不太同意其中一些观点,于是,有了我们频繁的讨论和“争吵”,有了我的商榷文章。而我们的友谊,也就在这讨论和“争吵”中萌芽与成长。

那时,我们可说是无所畏惧,豪气满怀。记得有一次,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振国说,总有一天,我们要让自己的著作像弗洛伊德的著作一样,走进每个人的书架!于是,我们疯狂读书,疯狂写作。我们以两个人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和《南京日报》等报刊开设专栏,在《心理学探新》、《苏州大学学报》等刊物联合发表论文,我们合作的《心理世界窥探》也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本书,当时我们还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为能赶上振国这位中文系的才子,我也只好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精雕细琢,用心打磨。通过一系列“小文章”的撰写,大大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现在很多朋友说喜欢我的文字,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个时期的训练。

回到各自的大学工作后,我们的合作仍然在继续。一方面继续写心理学普及文章,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拓荒。我们一起撰写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政治心理学》、《咨询心理学》、《交往的艺术》、《男女差异心理学》等等,大部分是国内的首创之作。

后来,振国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我们的研究方向也开始有比较大的差异,很少在一起写作,彼此的关注和帮助却从没停止。记得我撰写《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一书时,由于缺少当代思想的详细资料,振国马上给我送来他搜集的材料以及他自己没有发表的文章,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巨大帮助。而我到日本做访问研究以后,也与他合作做中日教育的比较研究,不久他也去了日本访学。

振国的学术敏感性与他的灵气一样,常让我敬佩不已。当我标榜自己是一个学术的旅行者的时候,当我虽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却无终身追求时,振国已把教育政策作为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振国就是振国。他坚持认为,只有当学术研究对现

实问题产生影响、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时,学术的价值才能充分展现。这是振国选定的道路。他每一年都召开教育政策的分析研究会议,为了学习,也为了捧场,每一次我都去参加,也慢慢培养起对于教育政策的浓厚兴趣。尤其是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和苏州市副市长以后,我的研究方向和兴趣,也逐步向宏观教育政策和区域教育改革转移,与他的联系也从来没有中断。

后来,振国到教育部工作,先在师范教育司担任副司长,后来到思想政治司担任副司长,再后来担任了主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的中央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作为政府官员,他仍然没离开学术。他和他的团队为国家教育决策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期间,他全身心投入,经常通宵达旦,很少回家。

虽然现在我们很少合作研究新的课题,但一直彼此关注彼此砥砺。他一直支持新教育实验的推广与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影响中国教育实践的探索;我也一直关注着他的研究,参加了他主编的国家统编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我到民进中央工作以后,也努力推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与中央教科所的合作,希望我们能够携手为中国教育再做一些事情。

四 急用先学：让工作更加理性

1993年,我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上万人的大学,又面临与苏州医学院和丝绸工学院的合并,教学管理的担子压在肩上,沉甸甸的。

于是,想到了学习。求学当找名师,弄斧要到班门。有专家告诉我,最近距离的管理学名家应数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授沈荣芳先生。他曾担任过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人类工效学会首任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科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运筹学会、中国基建优化研究会、上海系统工程学会、上海土木工程学会、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研究会等理事或副理事长。

沈老师也是在我国工科院校的管理专业最早开设运筹学、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师,写过《现代管理科学基础知识》、《应用数理统计学》、《管理数学》、《运筹学高级

教程》、《现代管理方法》等多部著作与教材,是国内著名管理工程和系统工程专家,在城市发展与系统管理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看他的简历,觉得与自己的专业背景有联系,所以就大胆地请教联系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提出把《高校教学管理系统》作为我博士学位的主要方向,沈老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他一贯主张博士生不是为了写一篇论文,应是了解决一个问题,真正地学以致用。他的一席话,让我如释重负。因为大部分博士生导师,是希望学生能够为自己的研究“打工”的,我自己在成为博士生导师以后,也往往要求学生以新教育实验为主要研究方向。

读博期间,我多次往来于上海苏州两地。因学校事务繁多,有时候我不能去上海,沈老师就乘火车到苏州“送教上门”。尤其是博士论文的攻坚阶段,我为用数理模型解决系统问题一筹莫展,沈老师就每周一次来到苏州大学,与我面对面对讨论研究。他不让我用汽车接,要我给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当我推着自行车和老师在大学校园里边走边谈时,我早已忘记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长者。

在他和吴启迪教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提前半年被授予博士学位。一年以后,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高等学校教学管理系统研究》一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首次比较全面地将系统管理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高校教学管理研究,提出高校教学管理系统的理论体系,在理性的视野下重新梳理高校教学管理系统的流程等重要问题。这本书注重历史与比较研究的方法,回顾高校教学管理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各种模式的特点与优劣,研究各国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机构等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高校教学管理系统提供了多维参照系。

同时,这本书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坚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平衡相结合,局部合理与整体优化相结合的原则,对高校教学管理系统进行详细分析,构建了包括目标子系统、制约条件子系统、动作与优化子系统、成果输出子系统和评估子系统在内的完整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对系统建立了评估模型。在教学管理动作系统的优化,尤其是教学环节的优化和专业教学计划的优化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本书还将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用于剖析我国高校教学管理面临的若干重要现实问题,对教育管理中的许多重点与难点问题,如教学目标(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的两难选择)、教学组织(学院制与学分制的积极探索)、教学效率(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教学内容(陈旧的课程内容体系与现代培养目标的内在冲突)以